

被引数据视域中的 城市综合年鉴考量

——以广东省市级综合年鉴为例

黄忠顺 李文蔚*

摘要 基于中国知网2009—2019年被引量统计分析,《广州年鉴》《深圳年鉴》《东莞年鉴》在广东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年鉴的影响力排名前三,且《广州年鉴》在全国城市综合年鉴影响力排名第二。该时段被引数据还揭示出两个现象,一是城市综合年鉴被引频次呈普遍下降趋势,二是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与其年鉴的外地引用占比呈反比关系。由此看出,一是从编纂出版端看,近十年地方综合年鉴正步入欣欣向荣的好时期,而从用户端看,其在新媒介环境下已面临利用率危机;二是文化知名度较低的城市,年鉴的利用与地情传播更依赖外地文化力量。因此,文化知名度不高的城市,其年鉴更需要主动“走出去”,积极加入使用广泛的大型文献数据库和检索平台。

关键词 综合年鉴 被引量 影响力 利用率

关于年鉴研究,在“编”与“用”两端,立足于后者的研究相对薄弱。即使谈“编以致用”,主要还是立足于“编”的意义、价值与方向,仍然属于“编”的研究范畴,较少触及“用”之研究的本体。立足于“用”的研究,当以“用户”为对象,围绕其使用行为、动机、需求展开研究。

本文将立足于用户行为,采用被引数据这一关于用户行为的计量统计来观察年鉴的利用情况,评价其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新时代综合年鉴提升利用率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最初是以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年鉴为观察对象,由于统计分析中需要比较视野,而当视野一旦放开,又被统计中新发现的现象所吸引。所以,被引数据的采集和视点,已不限于广东各市综合年鉴,还覆盖了全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地方综合年鉴。

* 黄忠顺,男,湖北省荆门市人,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李文蔚,女,湖北省武汉市人,东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

可资研究的数据库,有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知识平台、超星发现系统,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D)。CSSCI与CSCD的刊源在学术上筛选严格,所获被引数据在学术评价上可信度更高,但地方综合年鉴不是纯学术刊物,反而会觉得它妨碍了可采集被引数据的广泛性。超星发现系统可采集的被引数据最全面,它包括图书对综合年鉴的引用,但所检索的被引信息存在较多重复统计,过滤难度大。在数据的全面性上仅次于超星发现系统的,是中国知网,它比重庆维普、万方知识平台的数据更全面。它收录了国内最全的中文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工具书等,以及部分外文数据库,且使用更方便。所以,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其被引数据获取方法是,从中国知网的主页进入“高级检索”页面,在标有“主题”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被引文献”项,设定被引文献的时间区段,将选择结果调至“精确”,即可开始键入要采集的被引年鉴名称,从而进行检索和统计。

一、广东省级综合年鉴被引量排名与分析

由于广东各地年鉴创刊时间不一,《广州年鉴》1983年已创刊,有的市要迟至21世纪,故将被引数据的采集时间设定为200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获得以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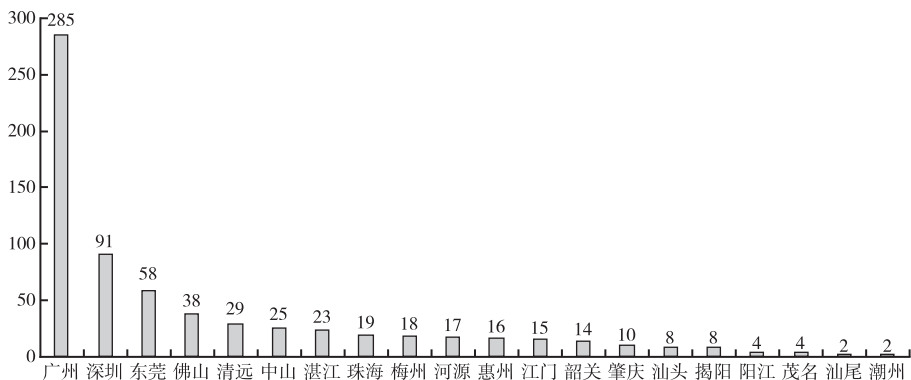


图1 2009—2019年广东各市综合年鉴被引量排名

在图1的被引量排名中,排名第一的是《广州年鉴》,其被引量远高于其他各市年鉴。它在2009—2019年间被285种文献引用,排名第二的《深圳年鉴》被91种文献引用,排名第三的《东莞年鉴》被58种文献引用,然后依次是《佛山年鉴》《清远年鉴》《中山年鉴》《湛江年鉴》《珠海年鉴》《梅州年鉴》《河源年鉴》《惠州年鉴》《江门年鉴》《韶关年鉴》《肇庆年鉴》被十余种至三十余种文献引用,《汕头年鉴》《揭阳年鉴》各被8种文献引用,《阳江年鉴》《茂名年鉴》各被4种文献引用,《汕尾年鉴》《潮州年鉴》《云浮年鉴》各被2种文献引用。

那么,可否依据这个被引量排序来评价其影响力和地位呢?通过被引量的统计来评估期刊的地位,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化学家P. L. K. Gross和E. M. Gros等人所做的工作。他们首次使用引文类型对化学期刊进行评价,证明了被引次数在评估科研工

作中的重要性。1960年,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Eugene Garfield 博士根据一定时间段内所采集期刊被引频次与可引论文总数之比,建立了“影响因子”这个概念。它后来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并延伸至对期刊论文质量的评价和作者以及机构的业绩评价等领域。在这种评价方法越来越受重视的过程中,也招致滥用,引来质疑。进入21世纪,起源于欧洲的世界性编辑学家组织欧洲科学编辑学会在其官方网站(<http://www.ease.org.uk>)上发布过一项关于“影响因子”不当使用的重要声明。这份声明仍然在一开始就强调“影响因子是一个定量的测量方法”,其“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对评价专业性和综合性期刊的总体水平是很有价值的”,然后才指出,如果运用这种定量测量方法时,不考虑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期刊论文被引用所存在的不均衡性,是不可取的。“用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代用品来评价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的影响力,是极不科学的”,“以期刊影响因子值取代论文实际被引用次数来评价科学家个人是极其有争议的”。^①可以说,目前得到业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反对滥用被引数据和影响因子,但并没有否定它在同类期刊的影响力和总体水平评价上的价值。

年鉴作为一种逐年编纂的连续出版物,在概念上属于“期刊”之一种。这里所做的年鉴被引量排序,均为地方综合年鉴,并没有将统计年鉴、各种行业年鉴和地方综合年鉴混放在一起做被引量排序,已经避开了不同类型年鉴可能存在的被引量的非均衡性对排序有效性的干扰。也就是说,它属于目前被认可的“同类期刊”量化评价范围。这里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概念,是因为地方综合年鉴与发表论文的期刊不同,它不存在发文量,不可能且没必要计算期刊的被引量与可引论文总数之比。影响因子作为一种测量指标,其实质仍然是被引量的高低。所以,笔者认为,广东各市综合年鉴被引量排名,作为一种客观量化观察地方综合年鉴使用状况和评价其影响力的数据是有意义的。量化测量的好处是清楚而明确,操作性强,可比度高。当然,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还需要向更精细化的数据完善,更需要与专家的主观评价相结合,才能够克服局限,进一步提升其有效性。

在图1的被引量排序的柱状图表中,《广州年鉴》的被引量之高,极其醒目。笔者做了四个直辖市综合年鉴同样时间段的被引量统计:《上海年鉴》被引335次,《北京年鉴》被引203次,《重庆年鉴》被引134次,《天津年鉴》被引56次。《广州年鉴》的被引次数仅低于《上海年鉴》。为了进一步确定《广州年鉴》被引量在全国各市级综合年鉴中的名次,笔者又对各省会城市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几个计划单列市综合年鉴的被引量进行了统计。从结果看,没有一个城市综合年鉴被引量超过《重庆年鉴》。由此,可确定《广州年鉴》的被引量在全国城市综合年鉴中排名第二。

为什么是上海、广州在全国排名第一、二呢?有一个因素不应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城市年鉴,《广州年鉴》创刊最早,1983年创刊。《北京年鉴》1990年创刊,《上海年鉴》1996年创刊。而在中国知网2009—2019年的被引年鉴中,有1854年的英文版《上海年鉴》,有民国24年(1935年)奇文印务公司承印的《广州年鉴》。广州、上海是中国近

^① 刘雪立译:《欧洲科学编辑学会关于影响因子不合理使用的声明》,《眼科新进展》2008年第9期。

代开埠最早的城市,年鉴作为西方舶来品从这两个城市最先登陆。也就是说,一方面,年鉴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形成有历史的积淀过程;另一方面,历史的积淀过程同时又促成命名为《上海年鉴》和《广州年鉴》的文献所积累的可引资源数量相对庞大。当然,言及该因素的时候也不应忽视,天津开埠于1860年,虽晚于广州和上海,但也是较早的,且《天津年鉴》创刊于1986年,也是比较早的,而其被引数据却并不高。

就2009—2019年被引量排名前三的中国城市综合年鉴的被引量之差来看,《北京年鉴》差《广州年鉴》82频次,《广州年鉴》差《上海年鉴》50频次,剔除《上海年鉴》中被引数据中的晚清民国年鉴(低于1/10)与《广州年鉴》中的民国年鉴(约于1/20),如此大的量差,足见这个排名不可能是偶然因素所能决定的。《广州年鉴》作为广东各市综合年鉴的标杆,代表了广东综合年鉴在全国令人瞩目的影响力和地位。

当然,如果仅从2019年这一年的被引数据看,《上海年鉴》被引26次,《北京年鉴》被引12次,而《广州年鉴》这一年下滑巨大,被引只有6次,被《北京年鉴》超越。而《深圳年鉴》被引13次,超越《北京年鉴》。

在2019年这一年的广东各市综合年鉴被引数据中,《深圳年鉴》排名第一;《广州年鉴》《东莞年鉴》并列第二名;《湛江年鉴》被引5次,排名第四;其后,《佛山年鉴》《韶关年鉴》各被引4次,《清远年鉴》《中山年鉴》《珠海年鉴》《河源年鉴》各被引3次,《梅州年鉴》《肇庆年鉴》各被引2次,《江门年鉴》《惠州年鉴》《茂名年鉴》各被引1次,《汕头年鉴》《汕尾年鉴》《揭阳年鉴》《阳江年鉴》《云浮年鉴》被引0次。

采集被引数据的年限时间截取过短,偶然性因素增加,会使得于评价年鉴的利用率、影响力和重要性方面的价值有限。例如,如果不只统计一年,而是将2018年的被引数据也纳入进来,则《广州年鉴》就又可与《北京年鉴》并驾齐驱。

二、被引频次呈现的一种应予重视的现象

笔者截取2009—2019年这样一个相对长时段来统计被引数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时间太短,采集的数据量相对较少,会降低数据统计分析的有效性。在数据的统计分析中,毕竟是数据量占有越大,其精度越高,数据量占有越少,受偶然性因素干扰就越大。其次,截取的时间段相对较长,还可以做趋势分析——观察一种年鉴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力趋势是上升抑或下降,由此可以对被引量排名给予一种动态性质的参数。

但是,当笔者将其趋势图呈现出来时,发现被引量相对较高的年鉴在趋势上呈下降态势的占比很高。考虑到被引量不高的年鉴,某年多出一篇被引文献,在趋势图上就会跳升明显。这样的趋势图,偶然性因素占比较高,不具有趋势意义。因为单次引用行为应该归入偶然行为,只有相同的偶然行为积累到一定的量,才能够形成趋势性。所以,当被引量相对较高的年鉴在趋势上呈下降态势较多,这实际反映年鉴在被引用上发生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它也是年鉴使用中出现的应予重视的新现象。

被这种新现象所吸引,笔者放弃了对广东各市年鉴做被引趋势分析的想法(统计中发

现,广东各市综合年鉴中,有许多年鉴的年度被引频次还达不到做趋势分析的数量要求),而将注意力展向更大的视野来关注被引频次趋势统计中发现的新现象。

下面是四个直辖市综合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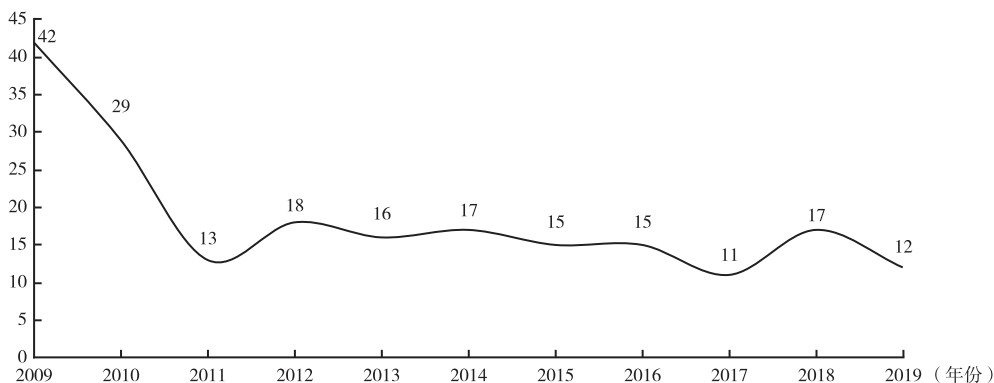


图2 2009—2019年《北京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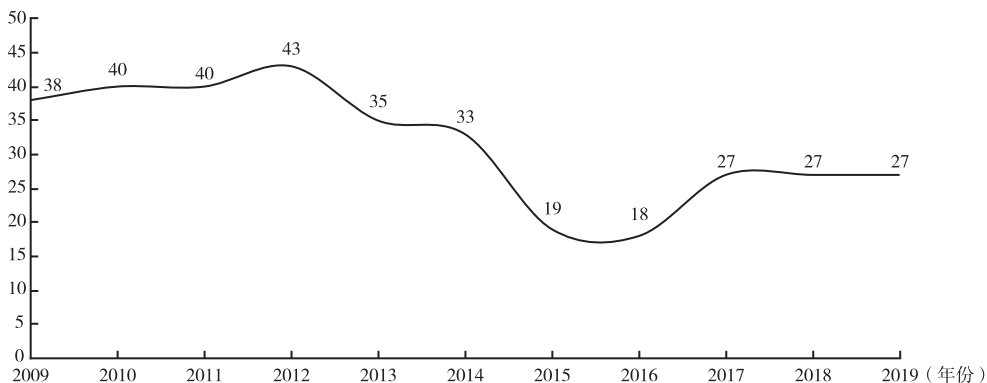


图3 2009—2019年《上海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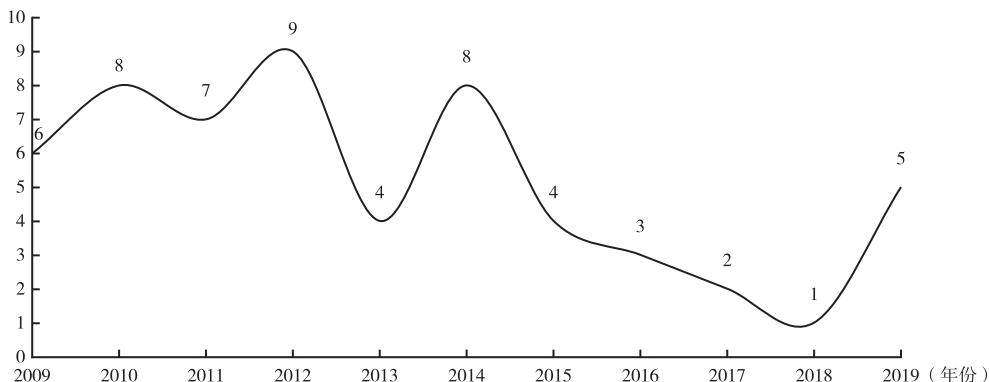


图4 2009—2019年《天津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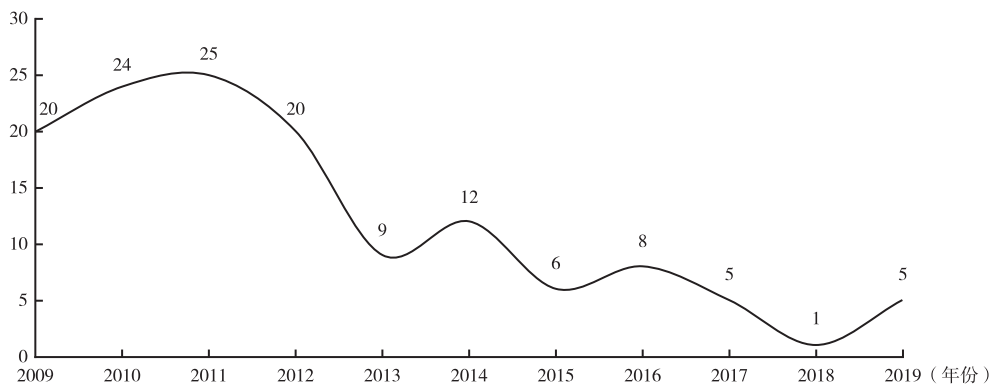


图5 2009—2019年《重庆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四个直辖市中被引量最低的《天津年鉴》是56次,因此,这里也选取广东各市综合年鉴中被引量在50次以上的年鉴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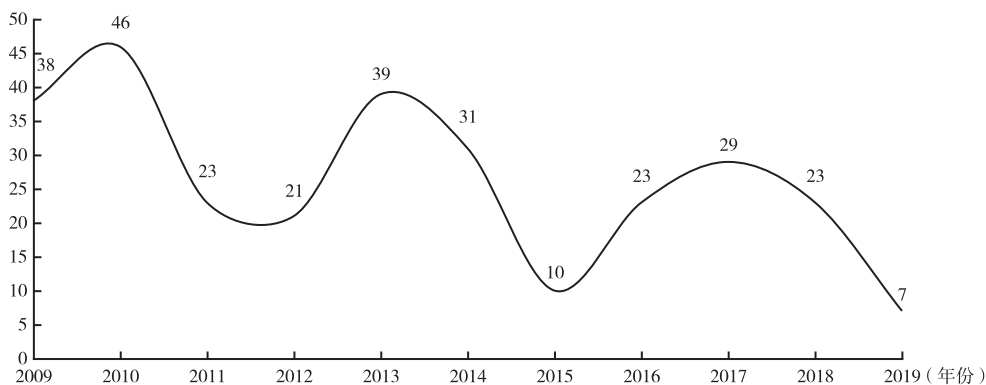


图6 2009—2019年《广州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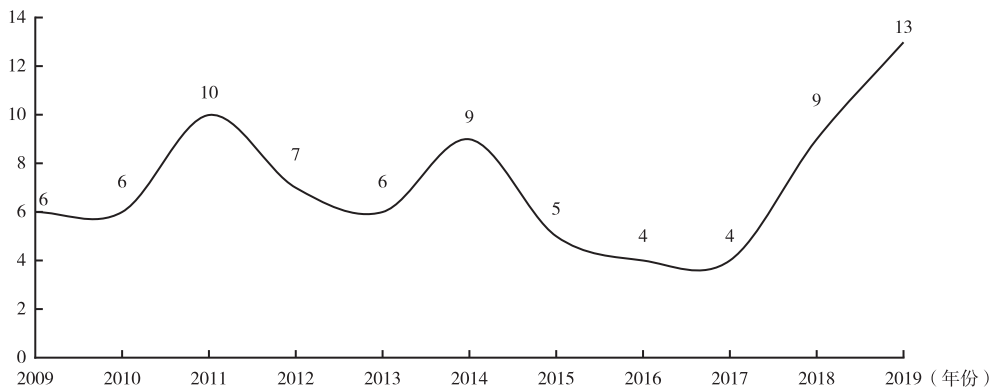


图7 2009—2019年《深圳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图8 2009—2019年《东莞年鉴》被引频次趋势图

图2至图8的趋势图形,其被引频次在总体趋势上明显下降的有6部年鉴,唯有《深圳年鉴》略有上升的趋势。它在2018年发生了一次较大逆转,将2017年下降至新低的被引频次拉升上来,2019年创出新高。

在27个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综合年鉴中,2009—2019年,被引量超过50次的有16种年鉴,剔除已经给出趋势图的《深圳年鉴》,只有《成都年鉴》《武汉年鉴》的趋势是上升的,《西安年鉴》《济南年鉴》无明显下降趋势,其余年鉴的被引频次均呈明显下降趋势。

为什么会如此普遍地呈现下降趋势呢?一般来说,年鉴有重要的存史意义,一个地区的综合年鉴,不仅只有新出版的年鉴有引用价值,其往年的年鉴也常在史料价值上被引用。比如《深圳年鉴》创刊于1986年,当时名为《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96年更名为《深圳年鉴》。《深圳年鉴》的被引量是这两部年鉴被引数据之和。其中,《深圳经济特区年鉴》在2009年—2019年被引18次,且2019年被引4次。也就是说,它的文献半衰期颇长。因此,以笔者目前统计被引量的方法来看,年度被引频次会因被引资源与往期年鉴的叠加而形成累积效应,导致被引频次的趋势持续上升,怎么事实上反而是呈现普遍下降的趋势呢?这种趋势显然也不可能是年鉴编纂的质量引起的。质量问题虽然可能会有影响,会导致被引频次下降,但不应该导致如此普遍下降的趋势。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各种新的信息发布平台如雨后春笋,极大地开拓了信息的传播渠道,提升了信息的更新速度,空前提高了信息的可及性,从而既改变了人们触及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信息汇聚、整合、资料汇编类出版物的利用率提出了挑战。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方志相比,年鉴原本是顺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而生,如今却因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巨变而使得用户被分流。这可能是一个规律——越是追逐社会信息更新速率的媒体,越是在媒体变革时代容易面临危机与挑战。正如日报之于书册,原本是更积极地响应人们对及时变化的信息的及时了解而生,却在互联网时代最先面临新媒体冲击。

纵观2009—2019年的地方综合年鉴,从编纂出版端看,的确是步入一个欣欣向荣更

加优质的时期,但用户端的引用数据却与之相背离,这种背离显示它在利用率上或面临危机与挑战。

三、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与年鉴利用率的改善

在城市综合年鉴的被引数据中,还有一个现象为笔者所留意,即一个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与其综合年鉴的外地引用率大致呈反比关系。

在广东省的城市中,虽然广州、深圳并列,深圳甚至有其更引人注目之处,但文化与经济不同,经济可以迅速崛起,文化难以一蹴而就。就城市的文化知名度而言,深圳虽然发展迅速,但广州既具有近代开埠以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拥有省会城市的文化聚集效应,其榜首地位一时难以撼动。

图9至图11为2009—2019年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年鉴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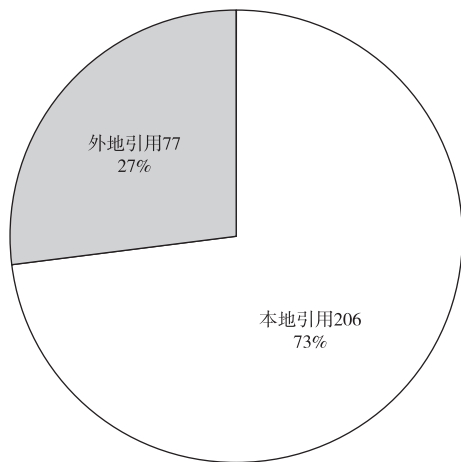


图9 2009—2019年《广州年鉴》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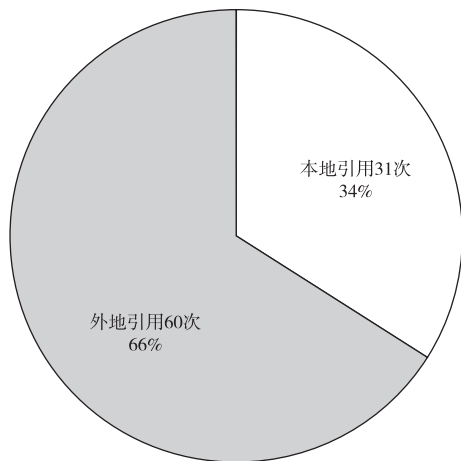


图10 2009—2019年《深圳年鉴》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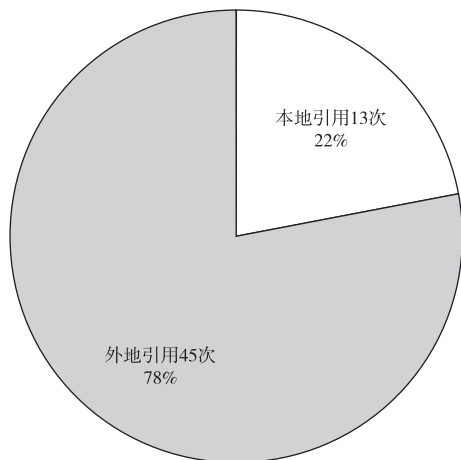


图 11 2009—2019 年《东莞年鉴》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

在图 9 和图 11 中,《广州年鉴》本地引用占比 73%,外地引用仅占 27%,《深圳年鉴》《东莞年鉴》总体形势与《广州年鉴》相反。《东莞年鉴》的外地引用占比高过《深圳年鉴》,其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也低于深圳。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没有将被引量排名第四的《佛山年鉴》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统计图陈列出来,它的占比与《深圳年鉴》相同,可以解释为佛山虽当代文化弱于深圳,但历史文化底蕴强于深圳。

一个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与其综合年鉴的外地引用率大致呈反比关系,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很好解释的。一个城市的文化知名度越高,通常意味其文化实力越强,也就意味着它对年鉴的利用率和传播力越强,其反映在年鉴的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上,就会出现上述现象。《广州年鉴》本地引用占比如此之高,是因为那里高校云集,拥有话语权的各种文化与科研机构云集所形成的对年鉴的利用优势和传播优势。与《广州年鉴》相比,《深圳年鉴》欠缺这种优势,《东莞年鉴》更没有这种优势,其年鉴的利用与传播就会相对更加依赖于外地的文化力量。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观点:由于一个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与其综合年鉴的外地引用率大致呈反比关系,文化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其年鉴的利用与地情传播相对更依赖于外地的文化力量。因此,文化知名度不高的城市,其年鉴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出去”,否则,地域的局限将束缚其年鉴的使用价值。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越迫切需要走出本地的年鉴在“走出去”上更易显得被动。且不说传统的邮寄赠送印本的方式,仅是中国知网收录年鉴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世界各汉学机构使用最广泛的知识库有一个是“年鉴”专库。在这个专库中,《广州年鉴》从 1985 年卷开始系统收录,更新至 2019 年卷,《深圳年鉴》也是从《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85 年卷(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一直收录更新到 2019 年卷。在该数据库中,广东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年鉴更新及时性可与《广州年鉴》《深圳年鉴》相比的就只有《清远年鉴》。《东莞年鉴》从 1997—2001 卷(创刊号)收录到 2017 年卷,更新迟滞两年。《中山年鉴》《湛江年鉴》只收录至 2015 年,《惠州年鉴》只收录至 2011 年,《茂名年

鉴》只收录了2006年卷至2009年卷,《潮州年鉴》《揭阳年鉴》只收录了2018年卷,《汕尾年鉴》《阳江年鉴》《浮云年鉴》没有任何收录。《佛山年鉴》等另外7种年鉴更新至2018年卷。

一般来说,中国知网既然设置了“年鉴”专库,它的目标理应是将其中国公开出版的所有年鉴一网打尽。他们虽然设有专门的部门主动收录,但是地域知名度和文化辨识度低的地方综合年鉴仍然被遗漏,或收录零散不全,或更新不及时。

还有一个由海量全文数据及文献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不容忽视,这就是“读秀”学术搜索。它收录了比中国知网更庞大的文献量,因为它收录那些中国知网不收录的书籍和民国书刊报纸等。“读秀”学术搜索在国内使用的广泛性上仅次于中国知网,海外汉学机构对它也特别看重并广泛使用。在实际使用中,年鉴在中国知网“年鉴”专库中的使用率是不及“读秀”学术搜索的。中国知网是分库购买,“读秀”学术搜索不分库购买,它是全库检索,能够为用户提供深入到图书章节和片段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文献传递以及高效查找,可实现获取各种类型文献的一站式检索。因此,“读秀”学术搜索可说是只重内容,不问出身,对地域知名度和文化辨识度低的地方综合年鉴的地情传播给了更公平的机会。

由此可见,在提高综合年鉴这一文化公共产品的利用率上,除了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比如在政府地情网链接年鉴数字版或建立全省、全国年鉴数据平台),从用户的使用着眼,可做的事还有很多。

四、结 语

从被引数据视域观察地方综合年鉴,可谓管中窥豹、一孔之见。毕竟被引数据只是用户端的一个量化维度,而且这个维度所覆盖的地方综合年鉴的用户看起来颇不全面,由此引来争议也在所难免。不过,从文献计量学上说,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年度地方信息组织和地方知识展现的重要工具书,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权威性的优势,其价值与其潜在的引用价值在逻辑上具有相关性,这就使其被引量排名、引用趋势、本地与外地引用占比等数据具有一定的揭示与发现功能。虽然在如何看待与利用被引数据上会引发争议,而有争议才会触动更多的人来进一步思考,并且这思考可将我们对年鉴的研究从编纂端扩展向用户端,这就很有意义。因此,在如今这个媒介环境巨变的时代,立足于用户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于年鉴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责任编辑:杨卓轩